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宋〕劉時舉 撰
王瑞來 點校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中華書局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宋〕劉時舉撰
王瑞來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宋)劉時舉撰;王瑞來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4.5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ISBN 978-7-101-09773-3

I. 續… II. ①宋…②王… III. 中國歷史—古代史—編年體 IV. 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49695 號

責任編輯:胡珂

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宋]劉時舉撰

王瑞來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7%印張·2插頁·342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册 定價:56.00元

ISBN 978-7-101-09773-3

前言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考述

引言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南宋劉時舉撰。全書十五卷，記載南宋從創立到中後期高孝光、寧四朝歷史，時代起訖爲一一二七年至一二二四年，將近一百年，佔據了南宋一百五十餘年歷史的三分之二時光。由於記事簡略，又有相關的史籍存世，因而此書一直不大爲研究者所重視。不爲所重，應用亦寡，對於此書的內容，學者大多不甚了了。對於撰者生平，更是一片茫然。本文在史料匱乏的狀況下，對於撰者生平進行了全力考索，並對此書的價值與特色試加闡發，同時還考察了與此書相關的一些問題。希望本文作爲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以下簡稱續宋通鑑）一書的導讀，能够引起研究者對此書價值的重視。

考述如下。

一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的撰者考索

續宋通鑑的撰者劉時舉是明確的，但其生平則是不明確的。

四庫提要稱：「時舉里貫無考，其結銜稱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載史嵩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舉爲廩學生，有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一事。其始末則未之詳也。」^(一)關於撰者劉時舉的生平，可謂是羚羊掛角，無迹可尋，神龍見首不見尾。

四庫提要云及劉時舉率太學生上疏力諫史嵩之父喪起復之事，載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理宗淳祐四年（一一四四）。是年九月，權相史嵩之父史彌忠病逝，就在其喪父的第二天，理宗就下詔讓本該丁憂服喪的史嵩之起復，擔任右丞相兼樞密使，並命令學士院起草詔書。

宋代的政治比較透明，理宗的這一舉措遭到了極大的反彈。這當然不是針對皇帝理宗，而是矛頭直指權相史嵩之，希望以迫其去位服喪爲契機，從而剝奪史嵩之的權力，改變朝廷的政治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經過三四個官員相繼發難之後，一場在當時看來波瀾壯闊、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驟然興起。先是太學生黃愷、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等一

百四十四人聯名上書，接著是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上書。抗議的風潮很快從中央官學波及到了同在京城的臨安府學。於是，就有了以本書撰者爲首的學生抗議，即「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後來，皇族教育專門學校的學生不甘寂寞，也發出聲音，「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二〕}。

四庫提要稱劉時舉爲「廩學生」，雖無大誤，但不若宋季三朝政要所記「京學生」準確。「廩學生」是指明清時代稱呼由公費給以膳食的生員，「京學生」則是專指臨安府學的學生。京學又稱「京泮」，宋人施諤淳祐臨安志卷六於學校府學記載府尹趙與憲贊頌皇帝賜書時便說「施及京泮」^{〔三〕}。四庫館臣偏愛以時語比況古代事物，往往有失準確。

九十四位京學生的抗議上疏，以劉時舉爲首，這表明上疏文字當是劉時舉所起草。今人編纂的全宋文，便將此篇奏疏收錄在劉時舉名下^{〔四〕}。除了續宋通鑑，這篇奏疏是劉時舉僅存的文字，吉光片羽，彌足珍貴，現具錄如下：

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政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

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似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磻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奔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託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王正月乙卯，太學九士扣闈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翹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令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

並非如四庫提要所云，僅僅宋季三朝政要記錄了劉時舉等人的抗議行動，宋史卷四一

四史嵩之傳也有簡略的記錄：「（淳祐）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

猶如驚鴻一瞥，閃電一瞬，國史有書，汗青留名，續宋通鑑撰者劉時舉的一生，史籍中只留下了這一耀眼的亮點，其他事蹟，杳無形跡。那麼，曾在臨安府學就讀，並作為學生領袖的劉時舉，後來的情況如何呢？對此，文獻難徵。不過，從續宋通鑑書前的署銜，對其仕履略可窺見一二。

在元刊本續宋通鑑的卷一、卷二之首，均記有「通直郎、國史編修官劉時舉」的撰者結銜與署名，不過這只是略稱，全稱見於元刊本續宋通鑑的目錄之前，即如四庫提要所錄，為「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這一署銜，給我們透露了關於劉時舉生平的一些寶貴信息。

「通直郎」為升朝官的最低一階，官品為正八品。宋代士人，無論通過科舉及第，還是經由學校入仕，抑或恩蔭、雜流補官，多由下層的七階選人一步一步向上磨勘升遷。由選人升遷至京官，由京官再升遷至升朝官。南宋人李攸的宋朝事實載：「先是，常參官自一品

以下皆謂之京官，未常參官謂之未常參官。近代以常參官爲朝官，未常參官爲京官。」〔五〕「近代」，指元豐改制以後的官制。元豐改制後，文官官階的通直郎至開府儀同三司稱爲升朝官，北宋後期又把同樣正八品的武官官階修武郎以上至太尉也稱爲升朝官。所以宋會要輯稿載：「通直郎、修武郎以上爲升朝官。」〔六〕

通直郎和升朝官，是什麼概念？宋朝的官員，絕大多數是底層的選人，也就是官制改革前的幕職州縣官。從州縣佐官到路一級機構的幕僚，甚至包括縣令，都是這類選人。除了進士高第的前幾名或中制舉者，從選人升遷到京朝官，是一個瓶頸，比科舉人官的競爭還要激烈。因爲除了自身政績，還需要幾個高官推薦，又有名額限制，命運已經不完全掌控在選人自己手中。大多數選人都默默無聞地老死於「選海」〔七〕，只有少數幸運者由於各種因素際會，能衝出這個瓶頸〔八〕。特別是成爲升朝官之後，纔會有光明的仕途。

劉時舉的結銜爲通直郎，表明他已經順利地衝出了這個瓶頸，開始步入中級官僚的階層。這與前述他作爲學生領袖振臂疾呼抗爭而獲得的聲望，絕非無關。社會輿論的褒貶，政治形勢的變化，都給一個官僚的升降帶來極大的影響。不過，從宋代仕途的通常情形考量，即使順利，從釋褐入官升遷到朝官，十四五階的跨越，也並非一蹴而就，磨勘、考課、循資，至少要耗費劉時舉十年的光陰。

我們再來看接下來的結銜「戶部架閣」。戶部架閣的全稱當爲「主管尚書省戶部架閣文字官」，其職事爲掌管儲藏帳籍文書以備查閱，猶今之檔案管理人員。架閣官看上去是個閑職，但也不是隨便任命的。宋史職官志載：「主管架閣庫，掌儲藏帳籍文案以備用，擇選人有時望者爲之。舊有管幹架閣庫官，宣和罷之。紹興十五年復置，吏、戶部各差一員，禮、兵部共差一員，刑、工部共差一員，以主管尚書某部架閣庫爲名，從大理寺丞周楙請也。嘉定八年，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九〕}從這一記載可知，架閣官的選拔條件是「有時望者」。宋人潛說友纂咸淳臨安志卷五，於六部架閣之下收錄了同樣擔任戶部架閣的陳晦所寫的六部架閣題名續記。這篇文章有助於了解架閣文字官的性質。其文云：

今尚書六曹有文書几閣之官，其漢掌故之遺乎？掌故主故事，今所掌直吏牘，若不相似然，是殆類強名者。雖然列屬文昌臺，而顯設其局，凡圖籍文案之藏咸在，其事嚴。旦朝入所治。同僚相與言，不過論文字，抵掌劇談，卒食，數刻而退，其職清。職事官有闕員，間於此焉取之。日又有詔，非科目及人材卓異與縣令之著績弗授，其選重。事之嚴，職之清，選又益重。然則官雖視漢掌故小異，而所以待是官之意，何遽不若漢？前刻登載凡百有十六人，爲相若執政者三人，爲法從者加多焉。接武鶡鷲，駸駸鄉用，方興未艾，又不可隲度也。

陳晦的續記寫於慶元戊午四年（一一九八）。這個時間大約要比劉時舉擔任戶部架閣官早出半個世紀以上。從陳晦記述的架閣文字官的性質看，「其事嚴」與「其職清」，正類似今天的檔案管理人員。但從「其選重」來看，則又遠比今天的檔案管理人員受重視。根據詔令規定，一定要科舉出身或特別人才，以及擔任過縣令政績卓著者方可任命。

或許有人會產生疑問，選任掌管文書檔案的官員，要這麼鄭重嗎？研究歷史，切忌以今天的體驗與想像加諸古人。宋代沒有像今天的後備幹部之說，但也有儲備人才的方式。南宋人趙升在朝野類要卷二專有儲材一條，云：「拔擢於此職，以待進用也。」朝野類要中有幾處記載了儲材之所。卷二的六院載：「登聞檢院、登聞鼓院、官告院、都進奏院、諸軍司糧料院、兩審計司，皆儲材擢用之地。凡作縣有聲等官，多除此。」同卷又於四轄條載：「提轄左藏庫、文思院、權貨務、雜買場，謂之四轄，亦為儲材之地。」其實，趙升沒有提到的「儲材擢用之地」，還有六部架閣。趙升說的「作縣有聲」，與陳晦說的「縣令之著績」是同樣的意思。並且「職事官有闕員，問於此焉取之」，更是明確表明六部架閣是儲材之所。據陳晦統計，曾擔任六部架閣官的一百零三人之中，有三個人後來官至宰相或執政，而後來擔任其他重要職位的官員就更多了。

根據上述對六部架閣官的認識，劉時舉擔任架閣官表明他擁有時望，或許就是由於他

曾經到地方「作縣有聲」。從上述記載還可窺見，架閣官只有吏部和戶部是單獨設置，其他禮、兵、刑、工四部都是一人兼管二部。由此可見，讓劉時舉擔任戶部架閣官是委以重任。並且從六部架閣爲「儲材擢用之地」的特點看，朝廷對擁有時望的劉時舉寄予厚望，所以他放到了這個位置，留待將來重用。

細讀上述宋史職官志的記載，有「擇選人有時望者爲之」一句，但此時的劉時舉已非選人而是官屆通直郎的升朝官了，元刊本所記結銜是否有誤呢？其實，「擇選人」爲之者，乃北宋舊制。宋史職官志的另一處記載可以釋疑：「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一員，嘉定八年置，以選人、京朝官通差。」^[10]南宋中期以後，宋朝的行政體制愈發細密，相當重視檔案的管理與利用，因此架閣官的任用，也不僅限於低級官僚的選人，中級官僚也在任用的範圍之內。

劉時舉還有一個職銜，是「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這又是一個什麼性質的職務，與上述的職銜有什麼關係呢？

南宋立國江南，爲了宣示承繼北宋的正統，極爲重視國史的編撰。早在紹興和議之前，政權基礎尚未穩固之際，便於紹興三年首建國史院，嗣後又於紹興九年設置實錄院，組織編撰國史、實錄。後來雖說是國史院、實錄院，實際上類似今天的兩塊牌子一個機構，此由「實

錄院吏兼行國史院事」的記載可證。在國史實錄院的機構中，設置有提舉國史、監修國史、提舉實錄院、修國史、同修國史、史館修撰、同修撰、實錄院修撰、同修撰、直史館、編修官、檢討官、校勘檢閱校正編校官等官員，還設置有點檢文字、書庫官、楷書等吏員數人。「編修官、檢討官」即是其中的官員。劉時舉身兼檢討官、編修官二職，既表明南宋機構之精簡，也表明對劉時舉能力的重視。

檢討兼編修官並非劉時舉的固定職務，而是一種臨時抽調的差事。從紹興三年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到乾道四年修纂四朝國史，再到嘉泰元年修纂光宗實錄，從宋史職官志的記載可以看出，編修官、檢討官等國史實錄院的官員都是臨時抽調，隨事設置〔二〕。這樣的差事，著名文人劉克莊也擔任過。宋史理宗紀載：「淳祐六年八月己酉，賜文士劉克莊進士出身，以爲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三〕

正是由於被臨時抽調擔任國史實錄院的檢討官兼編修官，劉時舉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國史、實錄的資料，得以按照自己的理念編纂了流傳至今的續宋通鑑。是爲劉時舉之幸，亦爲後世學者之幸。

劉時舉是何時擔任國史實錄院檢討官兼編修官的呢？這個問題關係到續宋通鑑一書成書時期的考定。上述提及國史實錄院的官員具有臨時抽調、隨事設置的特點，這是我們

考證劉時舉擔任國史實錄院檢討官兼編修官時期的一個關鍵。前面考證過，從身為臨安府學的學生到成為升朝官承直郎，劉時舉起碼要花上十年時間。作為京學生抗爭史嵩之、丁憂起復有明確的記載，時間坐標是淳祐四年（一二四四）。我們考察一下此後的宋朝國史、實錄的修纂記錄。據宋史卷四三理宗紀記載，淳祐五年，宰相范鍾等曾上玉牒、日曆及孝宗、光宗御集、經武要略、寧宗實錄〔一三〕。然而，這只是上疏抗爭事件剛剛過去的第二年，劉時舉絕無可能驟升為升朝官。宋史本紀在上述淳祐五年之後關於國史、實錄的修纂記錄，已在景定二年（一二六一）。宋史理宗紀載：「（景定二年三月）戊寅，賈似道等上玉牒、日曆、會要、經武要略及孝宗、光宗、寧宗實錄，詔似道、皮龍榮、朱熠、沈炎各進三秩。」〔一四〕在景定四年六月，又有一次進呈的記錄：「庚午，宰執進玉牒、日曆、會要、經武要略及徽宗長編、寧宗實錄。詔賈似道以下官兩轉。」〔一五〕此後，在度宗咸淳四年（一二六八）十二月還有宋朝的最後一次記錄：「癸巳，史館狀，理宗實錄接續起修。」〔一六〕

分析上述史料提供的三個時間數據，即景定二年、景定四年和咸淳四年，按照正常的官員升遷速度推測，景定二年那次的可能性比較大。此時距劉時舉作為京學生上疏抗爭的淳祐四年已過去十七年。從修纂到成書亦需耗費光陰，從景定二年略微上推，景定元年、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寶祐六年（一二五八）前後都有可能。

這一時間的推定可以表明，劉時舉在上疏抗爭後的十餘年時光裏，正常升遷到了升朝官通直郎。此外，更是確定了一個時間下限，續宋通鑑一書的成書時間，亦當在此之際。四庫提要認爲此書「當成於理宗之世」，固無大誤，然過於籠統。準確地說，續宋通鑑一書，當成書於理宗朝行將結束的末期。

關於續宋通鑑的成書時期與劉時舉的生平，還有一種節外生枝的說法。清人翁方綱等人執筆的四庫提要分纂稿中宋中興通鑑的解題云：「標題稱宋官，而中書『元太祖成吉思皇帝』，是時舉已入元後所成。」^{〔二七〕}檢續宋通鑑一書，提及「成吉思皇帝」者確有兩處，一爲卷十四嘉定四年內所載：「韃靼國兵與金人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未決。成吉思皇帝選精騎三千馳擊之，金人大敗，金帥執中以百騎奔還。」一處爲同卷嘉定六年內所載：「成吉思皇帝留其將撒沒曷圍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爲三路，攻取河北、河東諸州郡。」觀此二處所載，均無「元太祖」三字。因此，僅僅記載「成吉思皇帝」並不能證明續宋通鑑一書爲劉時舉入元後所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記有「成吉思皇帝」^{〔二八〕}，難道也可以說是入元後所作嗎？與這一錯誤的推論相關，四庫提要分纂稿還對續宋通鑑的記事起訖與卷數產生了懷疑，並做出了新的推論：「然其不載理宗後事，不可曉。疑本不止十五卷，後有所諱而去之邪？」四庫提要分纂稿的宋中興通鑑提要甚謬，宜乎最後不爲四庫提要的定稿本所採納。

二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的概觀和定位

(一) 紛紜書名

「必也正名」。在具體評論此書之前，首先有必要正名。此書通常稱作「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這是四庫提要的叫法，後成爲通行的書名。早於四庫全書的朱彝尊跋語則稱作「宋中興通鑑」^{〔一九〕}。其實，四庫提要的分纂稿也這麼稱呼。屈振鏞的跋語多了個「續」字，題作「續宋中興通鑑」。徐乾學讀禮通考^{〔二〇〕}在引用書目中稱作「續宋中興編年」，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二一〕}所記亦同。

上述書名，可以說都是詳略不同的簡稱。元刊本的每卷之前，更是簡略作「續資治通鑑」。那麼，準確的全稱是什麼呢？元刊本目錄的前後都赫然以大字標作「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明代前期曾編纂過文淵閣書目的楊士奇也在跋語中如是題名^{〔二二〕}。在楊士奇的跋語中，把署名李燾「起太祖至欽宗十八卷」的史書纔稱作「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因此，全名當如元刊本題名，叫作「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

不過，書名中的「續宋」二字，亦恐非劉時舉自題。因爲他不可能以「續宋」的表達將南

宋與北宋割斷，這不符合南宋人的理念。「續宋」兩個字，當係入元後，出自書坊編輯刊刻者之手。加上「續宋」二字，在今天看來，倒是十分清楚地昭示了此書的記述內容。

(二) 性質定位

關於續宋通鑑，元刊本目錄之後，刻有一塊牌記，這是書坊刊行者的識語。識語不長，引述如下：

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集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

宋朝中興，自高宗至於寧宗，四朝政治之得失，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鑑。

這幾句話是對此書的宣傳，然而又絕非是虛假廣告。寥寥數語，將此書的內容與特點講述得非常清楚，簡明而切中肯綮。歸納識語，可見本書的內容與特點。

第一，從體裁看，是編年史。講述南宋第一代皇帝高宗到第四代皇帝寧宗四朝的歷史。南宋的歷史起訖，用公元紀年來表示，是從一二二七年到一二七九年。算上末年總共在位不過五年的三個小皇帝，一共為九帝九朝。南宋的歷史，主要在前六個皇帝在位期間演進。此書所記高、孝、光、寧四朝，起訖為一二二七年至一二二四年。從時間上看，佔據了南宋歷史的三分之一。